

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的身份认同及创作

赖晓君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曾经活跃着一批江西作家。他们以天然的地缘身份结盟，或合作编撰小说，或相互评点作品，携手参与到早期的通俗小说发展事业之中。从地域文学视角审视，这个群体的形成以及作品主题的选择，既是作家对自身地缘身份的认同，也是本土深厚宗教文化的延续。此外，作为早期的通俗小说职业作家，该群体在小说创作中的摸索与创新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10—0113-06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研究”（ZGW1502）

赖晓君，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江西赣州 341000）

明代的通俗小说，随着万历以来小说创作和刊印的繁盛，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这其中活跃着不少江西小说作家、刊印家和批评家，他们从家乡流寓至建阳、南京等各大小说刊印中心，以天然的地缘身份维系，共同参与到早期的通俗小说发展事业之中。作为中国小说史最早的一批职业小说作家，这个群体的生成以及其所提供的创作经验，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认真总结。

一、地缘标识：江西小说作家群的身份认同

籍贯观念是我国社会传统的地缘认同观念，这种观念是由两千多年来“礼教、文化、方言和特殊行政法规与制度长期交互影响之下”逐渐培养而成的。^{[1] (P9)}何炳棣认为，就中国古代行政法规及科举制度所反映的种种社会现象而论，时代愈晚，则籍贯观念愈深。翻阅现今所存明代通俗小说作品，小说作家的署名一般按惯例都会标示出籍贯，由此，我们遂知诸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作者朱鼎臣是“古临”人，即抚州临川人；《铁树记》的作者邓志谟是“饶安”人，即饶州安仁人；《天妃济世出身传》的作者吴还初是“南州”人，即南昌人；《国色天香》的作者吴敬所是“抚金”人，即抚州金溪人，等等。

小说作家遵循惯例在书页中题署自己的籍贯，同时也表现出对这种地缘身份的自我认同。如明初江西作家李昌祺的文言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该书先后附有12人撰写的序、跋，其中11人都是江西籍。^①对此，桑兵认为：“中国为人情社会……同乡同学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2]以天然的地缘身份维系小说创作、批评甚至刊印等活动，确实在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以聚集在福建建阳的江西通俗小说作家、批评家为例，其关系网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小说编撰的合作关系。朱鼎臣与吴还初合作编撰了《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该书题署为“南州西大午辰走人订著”、“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西大午辰走人”即吴还初。吴还初与涂德孚合作编撰了《天妃济世出身传》《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前者题署“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逸士涂德孚校”，涂德孚系饶州浮梁人。邓志谟与丘兆麟合作编撰了《精选故事黄眉》，该书题有“此书辑于云锦邓百拙生、校于羊城毛伯丘公”，校者丘兆麟，字毛伯，为抚州临川人。

第二，以撰序、批点等为主要形式的小说文本批评。《精选故事黄眉》书前《故事黄眉引》署“东汝合辉魏光国谨题”，

魏光国为抚州东乡人，与该书校者丘兆麟同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最值得关注的是邓志谟《丰韵情书》中《情书小引》的作者“坦然生”，他不仅为邓志谟的作品写序，还在书中一一点评。“坦然生”即周文炜，抚州金溪人，明代南京著名周氏刻书家族的成员。周文炜在该书评点男女主人公分隔江西和南京两地时，有一段眉批云：“豫章抵金陵，水隔水；金陵上豫章，山隔山。遥寄一缄书，室家诚雍睦哉！”^[3]

此番评点可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明代万历年间，周氏家族由周文炜之父周庭槐，从江西金溪迁出。到清代康熙年间，周文炜之子周亮辅仍在其编印的书籍中沿用“金溪”、“绣谷”等题署。事实上以“绣谷”冠名的周氏族人、书坊也极多，万历二十一年（1593）周氏万卷楼刊印的《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就题有“绣谷周曰校应贤父督刊”。^{[4]（P561）}这类地缘标识在周氏刊印的作品中历历可数，与前文提到的周文炜评点内容结合起来看，似乎越是远离家乡，它们所体现的地缘情结以及由这种认同情感维系的社会活动也越发明显。

万卷楼是明代南京刊刻小说最多的书坊之一，我们对于流寓南京书林的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的考察不妨以此为关注中心。万历二十五年（1597），周氏万卷楼重刻的《国色天香》，卷首题有“抚金养纯子吴敬所编辑”，该书的作者吴敬所也是金溪人。同年，万卷楼还刊印了《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该书卷首作者自叙为“饶安完熙生”，化名“完熙生”的小说作者已不可考，仅知这位饶州府安仁县人士于当年正月在万卷楼完成了该书的编撰。此外，鲁迅《关于小说目录》一文中，在“《国色天香》”条后括号内注：“十卷。明谢友可。万历二十五年刊。十本。”^{[5]（P204）}将《国色天香》的作者直接归入谢友可名下，大概是依据书前序文署题“九紫山人谢友可”。谢友可即是谢廷谅，字友可，也是抚州金溪人。他于万历十年（1582）参加江西乡试中举，同榜还有后来为邓志谟通俗作品撰序的族兄邓士龙以及署名抚州临川人的周曰庠。而无论《国色天香》的作者是否谢友可，该书从编者到序者，以及数次刊印者皆为抚州金溪人已是事实无疑。

南京书林《国色天香》《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作品的成书、刊印和流传，以及其所代表的“创作——评点——刊印”的流水模式，显示出作家、批评家、刊印家以“金溪”为牵系的重要地缘特征。而这种特征，在建阳书林的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南京“创作——评点——刊印”模式不同的是，建阳的江西作家群则以合作编辑小说和文本批评为主要形式。

二、神魔小说：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的创作主题倾向

研究者普遍认为，万历后期是神魔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大量神魔小说纷纷问世，这是通俗小说史上罕见的现象。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以明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刊出《西游记》为界，排列出此后近三十年间，即至泰昌元年问世的神魔小说共19部，其中有7部为江西籍作者作品。另外，再加上《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所收录的万历刊本吴还初所著《五鼠闹东京》，江西通俗小说作家们在这一时期的神魔小说创作热中的表现堪称夺目。^②

明代江西省境与今大致相同，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鄱阳湖连接长江。境内优越的自然山水资源是历代宗教人士潜心修行的“洞天福地”，同时也寄托先民对自然解读的无限想象力。明代后期佛、道二教的复兴趋势都与江西密切相关。前者恰逢这一时期的“禅宗复兴运动”，“复兴基地是江西和浙江一代的山林”。^{[6]（P538）}后者则可以《道藏》的编修情况为证。明初永乐年间，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奉明成祖诏纂校《道藏》，但未及完成，成祖崩，其后数位皇帝皆弃置不理，到英宗时才重新督校，万历三十五年（1607），神宗又敕龙虎山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道藏》。

正是在这样浓厚的宗教氛围当中，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意大利人利玛窦第一次经过南昌城，他对南昌的印象是：“这里的人比广东人更崇拜偶像。”^{[7]（P102）}事情缘起于他准备借宿于当地一座叫作“铁柱宫的著名寺庙”^③，当地人跟随他进了寺庙，冀图强迫他拜神像。利玛窦在手札里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这间明代江西著名寺庙：

有关这个地方的传说是，几百年前，有个叫许真君（Hui-unsin）的人，把大量钱财散发给附近的百姓，这是他把水银变

成极纯的银子得来的。而且，据说他用法术使该城免遭恶龙为患，用泥土埋住恶龙，把它拴在铁柱上，人们还可以在这里看见铁柱。然后他和他的全家，带上他们所住的房屋，一起升了天。这座寺庙的规模和景色颇值得一观，它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市集，几乎想要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寺内的主持都是前面称作道士（Thausu）的祭拜偶像者，他们蓄着长发长须。^{[8]（P284）}

在利玛窦的文字描述里，可以推测出明代南昌这间形成一定规模的寺庙，其祭祀的主神事迹流传清晰、广泛，祭祀的活动频繁、兴盛（“它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市集，几乎想要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信众人群庞大——即由许逊崇拜发展而来的江西道教中最具本土特色的净明道。关于许逊斩蛟治水事迹主要流传于江西及邻近福建、湖北、湖南相交之处，尤其是以北部鄱阳湖水系为中心辐射四围。明代江西笔记小说亦多有记载，如南昌人陈弘绪在其《寒夜录》中云：“许旌阳铁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铁钟，在游帷馆……”^{[9]（P35）}在福建建阳书林编撰小说的饶州安仁人邓志谟，则将许逊斩蛟治水的事迹，结合江西民间有关的大量神话传说，敷演出二卷十五回的《铁树记》，并由建阳余氏出版。邓志谟的家乡安仁县在鄱阳湖水域附近，且他还有在南昌居留的经历，因而对许逊传说十分熟悉。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对个体的塑造力极大，“等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10]（P5）}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邓志谟在他的小说创作生涯中会选择许逊事迹为题材，并且如此热衷于神魔故事为主题的作品。

除《铁树记》外，邓志谟还著有《飞剑记》《咒枣记》，分别讲述道教全真派祖师吕洞宾事迹和道教神霄派重要人物萨守坚修道成仙的事迹。与邓志谟交好的吴还初，与另外两位江西同乡朱鼎臣、涂德孚合作编辑的作品也都是神魔主题类，如《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天妃济世出身传》等，后者是以流传在东南沿海的妈祖信仰为蓝本。朱鼎臣单独编撰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则是西游故事诸多版本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全书十卷六十七则，叙唐僧出世的内容，与杨致和本、世德堂本等有异。小说中有一处细节耐人寻味，在“小姐囑儿寻殷相”中，朱氏将金山寺地址径改为“江州”，后又作“洪州西北地方约有一千五百里田地，那里有座万花店”。徐朔方称之为“地理方位和距离都错得厉害”^{[11]（前言）}，但如果考虑到作者朱鼎臣江西人的身份以及现实江西的山水分布，对这一情节的阅读体验则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从辑改、编写到创作：江西通俗作家群的小说编创模式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早的一批小说从业人员，江西通俗小说作家并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作品数量虽然不少，但没有像“四大奇书”那样堪称确立“典范”的作品；相反，作品中甚至有疑似直接删改“旧本”以重新刊刻的简单、粗暴的编创行为……这些情况犹如分类标签一般，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文学价值评介。事实上，对于作家群的研究，也不仅仅在于揭示群体本身的文学成就，而是选择从特定的维度入手考察作家群体的创作轨迹，总结其为整体文学发展所提供的经验与启示。

将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的全部24部作品作整体性考察，其小说编创模式大致可分为辑改型作品、编写型作品和创作型作品。

辑改型作品有《新锲公余胜览国色天香》《新锲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两汉开中兴传志》《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新刻增补燕居笔记》《岳武穆精忠传》等。大致有两类编辑方式。

一是作家采取删减情节、调整文字等编辑手段，对原有题材或“旧本”进行加工处理，“新本”与“旧本”之间，大体面貌相同。此类作品在刊出前，都早有流传于世的祖本、旧本或别本。如完熙生本《百家公案演义》（即“万卷楼刊本”）刊行于万历二十五年，而安遇时本（即“与耕堂刊本”）据书末记为万历二十二年；前者为六卷一百回，后者为十卷一百回，且后者比前者要更早面世。

二是作家将有关题材辑录成集，但对辑录的单个题材文本本身不进行创作性修改，作品仍保持原有的叙事结构、情节、

语言面貌等。在这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承担的角色与今天出版行业的“编辑”一职重合，如《国色天香》和《燕居笔记》同为明代后期传奇小说选集，收录了《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钟情丽集》等众多中篇文言传奇小说。这些作品在未辑录成集之前，早已以其他形式存世、流传，作者仅是遵循一定原则，将现有的单篇作品辑集成册，以新刊问世而已。

编写型作品为作家以现有题材进行文学处理，并具有一定的创新。它与辑改型作品的区别在于作家对题材进行了文学性的创作，并且这种创作的结果，直接成就该书在相同题材作品中的署名指向相当明确。通俗地说，就是没有所谓的“祖本”、“旧本”，或自身就是“祖本”、“旧本”。编写型作品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类书体小说中的《增补故事白眉》《精选故事黄眉》《新刻洒洒篇》作代表；另一类以《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新科全相五鼠闹东京》为典型。

总体而言，编写型作品与辑改型作品相比，文本中的文学创作元素有明显增加。对同类作品的模仿虽仍有迹可寻，但作家处理时的文学技巧却也显示出别具匠心，二者都令人无法忽略。

创作型作品因作家创作比例较高，因而文学价值也相对较高。这些作品的原始素材，经过作家的一手提炼、打磨，整体呈现出新的文学面貌，部分作品甚至在之后的版本流传中自成体系。这类作品的刊出，对小说选题材内容的传播或小说类型的嬗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后者如争奇系列小说。《花鸟争奇》等系列小说应是目前能见到的该体例最早的小说作品，极具代表意义。^④该系列小说自第一本《花鸟争奇》面世后，陆续又出有《山水争奇》《风月争奇》《蔬果争奇》《童婉争奇》等，且除该系列早期的作者江西人邓志谟外，还吸引魏邦达、朱永昌等人加入创作阵营，分别著有《梅雪争奇》《茶酒争奇》。今人尽可据其系列作品的集中问世，推测小说成书及后续畅销的种种场面。争奇系列小说以游戏为主旨，有强烈炫才倾向，无疑是明代一众强调道德风化承载作品中的异类，并对后世才学小说影响深远。

此外，江西作家在他们偏爱的神魔小说中的创作可谓用力最勤，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经典形象的再生。小说《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取“罗汉”之名，却并非叙述佛经中原有的“四大罗汉”、“十六罗汉”事迹，书中“二十四尊罗汉”的形象“显然是本书编撰者朱星祚的创造”。^[12]小说主要内容取材于《五灯会元》《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典籍，并将这些素材重新编排，生成“二十四尊罗汉”的人物系统。文学创作的技巧仍显得较为简单、粗糙，作品本身却藉统一的主题与结构而自成一体。《天妃济世出身传》中的主神天妃，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主要事迹为海上救人及“善司孕嗣”^{[13] (P435)}，而在以其事迹为单行的通俗小说时，则加入以汉代为背景的御番护国事迹，并将此与海上救济并重，小说中的天妃形象也兼顾“顺济”与“护国”的双重特征。

第二，叙事结构的重新构建。作为一部独立刊行的通俗小说，《铁树记》首先设计了第一回“总叙儒释道源流群仙庆贺老君寿”与末回（即第十五回）“武昌府郭璞脱凡许真君拔宅升天”首尾呼应的宏观结构，并以许逊个人事迹为线索，串通其他真君事迹，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文本。总体说来，《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天妃济世出身传》等作品，虽然小说的结构模式多有类似，但与原始题材的神话、传说相比，显然已经形成独立、完整的叙事结构。

第三，情节变化改变叙事节奏。由原始素材到通俗小说，文本的篇幅必然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增饰部分的分配情况相应改变了原有的叙事节奏。《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的故事情节与宋普明禅师编《香山宝卷》相似处极多，但第十五回“香山修禅点化善才龙女”，第二十一回“狮象托身拖去清音”至二十四回“妙善救得君臣返国”为增加情节。^[14]这两处增加情节，其一添置在妙善魂游地府后、救助庄王前，另一添置在妙善治愈庄王之后，都在以妙善为主要叙事线索之外插入其他情节，造成以妙善为主线的叙事暂时中断，而介入情节延长的叙事部分，连接上主线后，又为小说主线的矛盾冲突增加了张力。就这些宗教作品来说，人间的“修行”部分一般是作家发挥和增饰的着力点。除了上文提到的情节变化模式外，人间生活情节的嵌入，也对小说叙事节奏产生影响。小说《天妃济世出身传》第九回“玄真女机上救舟”，关于林长者以“四佳声”教导子女，其妻教女等情节的刻画，都是一种对情节的“减速”处理，而“减速”的技巧，则往往在于“通过家庭琐碎事件的精雕细刻来展现

世俗生活情趣”^[15] (P404)。这些叙事节奏的变化，客观上促成了作品新的审美特征的呈现。

第四，与经典作品塑造的经典世界的融合。《铁树记》中第十二回“许旌阳四次斩蛟龙王太子辅孽龙”，有“南海龙王敖钦第三位太子”出场，欲助孽龙报仇，其中“如意棍”和“龙王太子”等设置明显受到西游系列的影响。作家将“如意棍”和“三太子”两处在原著中相隔甚远的情节，融合进一回之中。所谓的“如意棍”，原为“如意金箍棒”，而“如意杵”纯属作家新编，回末观音罚助孽龙的太子等唐三藏西天取经“做个骡子”则几乎照搬。这样的情节处理方式如笼统地归结为“抄袭”，未免有失公允。作为该类小说的典范，《西游记》的刊行对其后作品影响巨大。经典小说构建的艺术世界为后来作品袭用、借鉴，这类情况在当代小说创作之中也并不少见。其经典之处，正在于为后人营造的且被后继作品引为常识性的设定，如武侠小说中的各大门派少林、武当，西方魔幻文学系列的巫师、麻瓜等。《铁树记》取可大可小的“如意棒”，顺延设置出相同功能的“如意杵”，再编撰出龙王太子被罚的新缘由，将原本孤立的、地方性的神话世界，续接进经典文本的共识系统，成为其理所当然的分支故事。这种借鉴经典作品的情节或细节并加以文学的改造，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互文性”的阅读体验，作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早期的创作尝试，批评者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如迁居南京的周文炜，在评点其江西老乡邓志谟作品时所感“此处一事一问，家园景象即在人之目中”^[3]，诸如“抚金”、“古临”、“羊城”、“饶安”、“南州”、“昌江”、“绣谷”之类的代称，其意义早已不仅是名前点缀。它们在折射出作家对地缘身份认同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联系和推动着作家群的创作、评点等小说活动。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的创作经验及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天然的地缘认同情感，在通俗小说早期的发展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11位江西籍评点者中，甚至包括后来上书明英宗，间接导致“剪灯”系小说被禁毁的李时勉，以及现存《剪灯余话》最早刻本的刊印者张光启。

②不同研究著作因研究需要及概念划分不同，相应小说文本的统计数量也略有差异。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则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谭正璧等《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等书所录，大致推断明清神魔小说数量约为38部左右。2009年出版的《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是作者冯汝常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书后附录罗列明代神魔小说作品共24部。无论是采用以上哪种时间取样，就万历后期神魔小说作品数量而言，江西作家8部作品都应当极具分量。

③南昌城内及周围有多处宫庙祭祀许逊，此处利玛窦所指应是城内的铁柱万寿宫。

④以“争奇”命名的书，今存还有万历四十八年的许以忠辑《车书楼汇辑各名公四六争奇》等。从书名来看，“争奇”似乎仅作为其广告营销的噱头，实际内容和文学属性都与争奇系列小说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1]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 [M]. 台北：学生书局, 1967.

[2] 桑兵.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J]. 历史研究, 1999, (3).

[3] (明) 邓志谟. 丰韵情书 [A].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七辑) [M]. 台北：天一出版社, 1985.

[4] (明) 王锡爵, 陆禴之. 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 [A].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92册)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
- [5] 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6] 杜继文, 魏道儒. 中国禅宗通史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7] 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 (1582-1610)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8] (意) 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M]. 何高济, 王尊仲, 李申, 译. 何兆武,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明) 陈弘绪. 寒夜录 [A]. 丛书集成初编(2953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M]. 王炜,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11] (明) 朱鼎臣.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A]. 古本小说集成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2] 方胜. 谈谈《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 [J]. 明清小说研究, 1988, (4).
- [13] 周燮藩.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47册)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 [14] 周燮藩.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110册)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 [15] 黄霖.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